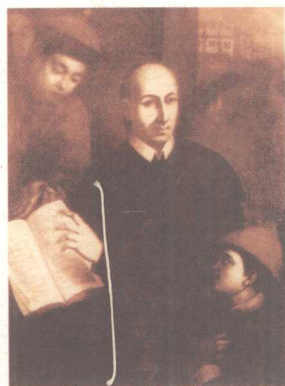


1500-1800
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美] 孟德卫 / 著 David E. Mungell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
1
1

1500-1800 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美] 孟德卫 / 著 David E. Mungell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 (美)孟德卫著. 江文君、姚霏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

ISBN 978-7-80225-168-7

I. 1... II. ①孟... ②江... ③姚...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1500~1800 IV. 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391 号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美)孟德卫 / 著 江文君、姚霏 / 译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崑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168-7

定 价: 2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言

1970年,我在伯克利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专业是中西交流史。当时的我一度认为,艰深的知识只能促成你在狭窄的专家圈中与人交流。但经过多年的教学后,我意识到对一个课题有更好的理解,方能更好地解释它。因此,经过这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是时候直面广大的读者群了。罗曼和利特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这套“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丛书,给了我这个机会。

1999年,本书第一版所受到的热烈欢迎至今令我满足。这次的第二版呈现了34年来现代前期中西交流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是写给历史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作品,其主旨是要通过一种最清晰易懂的方式来呈现观点、给出信息,其学术价值便退居次要了。这本书没有脚注。我并非完全满意这种在注释中删除一连串致谢对象的行为,但是我希望这种省略能从教学目的出发得到原谅。我要在这里强调,学术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

得力于另一些学者的贡献。虽然书中已经尽量减少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但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是力求独具一格而引发挑战。

第一版出版后的6年进一步证实了我在其中提出的1500—1800年和1800—1997年的两个历史模式。但在第二版中，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调整。没有一个殖民地比澳门在1500—1800年的中西方相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随着1999年12月20日（香港回归中国后的两年半）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回归中国，我们有必要将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800—1997年调整为1800—2000年。

第一版的一处不足就是缺乏从人物纬度出发的小故事。出于更好地平衡第一版中的思想、宗教和艺术内容，我在第二版中加入了一些叙述性的内容，用以展现那些参与重要历史循环的人物及他们的趣事、争斗、胜利和小智谋，特别添加了一些关于女性、性、音乐和科技的材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第一版中没有的生动感。

第一版的第二个缺点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处理。最近日益兴起的一种研究倾向表明，中国中心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理想观点，并非总能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我试图在新版中更好地考虑和表达这点。

对明朝以后中国帝王最普遍的指代方式是通过他们的年号，而不是名字。“康熙”就是一个年号，并非他的名字，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书中用“康熙皇帝”而不是“皇帝

康熙”。相似的,我们会称罗斯福总统为“新政总统”而不是“总统新政”。当然,康熙皇帝有自己的名字,他的正式名字是“玄烨”,有时我们也会用他的谥号“圣祖”来称呼他,然而,这种复杂的情况还是避免在这薄薄的著作中提及比较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书中其他君王身上,例如崇祯皇帝、顺治皇帝、乾隆皇帝等。在这些表达过程中,我使用的是中文的罗马拼音形式。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最令人沮丧的是未能找到图片1.3“神奇的茶壶”的出处。我和许多中国学者以及档案管理员有过交流,仅得到了以下信息:这幅漫画出现在英文版的《谢诺的中国农民起义(1840—1949年)》(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3)一书中,书中第172页的图片说明中写道:“俄国漫画,作于1901年前后,中华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第一版创作时,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这个组织的记录)。这张漫画的内容相当清楚地指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随着本书第一版的发行,我听闻这幅漫画的原作尚存,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有一个稍显不同的版本,但这一情况还未得到确认。我还有了另一发现:中华圣公会脱胎于大不列颠的福音复兴运动,且作为一支向非洲和东方的传教团体,成立于1799年。它是英国教会中一支独立的传教志愿团体,一度拥有1300名传教士,外加上百名神职人员和教师。它于1812年更名为中华圣公会。

我要感谢“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丛书的编辑圣路易斯大学的唐纳德(Donald T. Critchlow)教授邀请我写作这本书。我要感谢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对本书第一版出版工作的协助,特别是组稿编辑斯蒂芬(Stephen M. Wrinn)先生、制作编辑琳恩(Lynn Weber)小姐和文字编辑谢理尔(Cheryl W. Hoffman)小姐。关于第二版,我要感谢主编苏珊(Susan McEachern)小姐、她的编辑助理贝克(Becki Perna)小姐和制作编辑奥尔登(Alden Perkins)小姐。我曾受惠于杨百翰大学哈罗德·李图书馆亚洲资料馆馆长盖尔(Gail King)博士,由于她的帮助,我获得了徐甘弟大夫人的画像;也曾受惠于伦敦大学的蒂德曼(R. G. Tiedemann)博士,在他的帮助下寻找存于英国档案中的“神奇的茶壶”漫画的出处。我还要感谢许多在第二版的写作过程中帮助我从事艰苦的查找出处、翻译以及获得图片使用权等工作的人们。我还曾经受到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米歇尔(michele fatica)教授、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西奥多(Theodore N. Foss)博士、斯坦福大学哈罗德(Harold Kahn)教授以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等的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贝勒大学及其历史系对本课题的支持。

1977年,我的第一本书献给了我的妻子。今天,再一次的,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对她的回忆。Christine McKegg Mungello(1946—1997),愿她的灵魂安息!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by D.E.Mungello

Copyright © 2005 by D.E.Mungell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历史概览	1
第二章 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接纳	22
耶稣会士的“本土适应”	22
让中国文人信仰基督教	27
作为秩序破坏者的基督教	35
“礼仪之争”氛围下的中国图景	38
中国思想大门的关闭	43
中国对欧洲科学艺术的反应	51
第三章 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排拒	66
中国反基督教意识的根源	66
中国反基督教运动	78
中国宫廷中的欧洲艺术	83
文人画家身边的欧洲艺术	92

第四章 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	110
早期赴欧的中国访客	110
“礼仪之争”氛围下的欧洲图景	116
早期汉学家	120
莱布尼茨、白晋和“索隐派”	129
欧洲视野下的文人传统:儒学对抗新儒学	136
中国艺术对欧洲艺术家的影响	140
第五章 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排拒	153
马国贤的男孩们	153
推广中国文化的欧洲人	160
启蒙时代对中国道德政治体系的理想化	167
博学家与哲学家对中西碰撞的不同观点	173
中国人是如何由白变黄的	176
马戛尔尼使华(1792—1794)	181
总 结	187
译名对照表	193

第一章 历史概览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其间检阅仪仗、发表公告,并举办宴会、燃放烟火加以庆祝。英国的肃穆完全为中国的热情所淹没。当英国的皇家游轮“大不列颠”号带着王储查尔斯王子驶出香港,很多人明白,这一事件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仪式本身的象征。6个月后,“大不列颠”号退役,被改装成一艘供人参观的游轮。英国人已无力以一种体现世界霸权的豪华方式来使用它。与此相反的,中国却正以不断加速的态势,取代美国成为21世纪发展的助推器。

对于那些还记得半个世纪前中国经历的反资运动、革命动乱、工业衰败、贫穷以及普遍饥馑的人们来说,中国将

成为世界资本领袖的这种说法相当于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然而,如果以历史提供的更深远的视角来审视就会发现,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不是一个新鲜观念,而是过去历史的回归。那些只看到 1800—2000 年中国历史的人们,或许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观点。在那个时期,中国成了一个不能与现代世界对话的落伍的帝国,直到其遭遇帝国主义势力的实质性侵吞。甚至,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在 1858 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的缝隙中形同枯槁般生存的庞大帝国……被武力隔绝在正常的国际交流之外,于是,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的从属国——邻国日本却进行着快速的现代化,并开始把中国看作获取廉价劳动力的软弱易欺的殖民地。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1937—1938 年日军对南京发起的大屠杀,奸淫掳掠导致 30 万南京平民命丧黄泉,这正是中国那 200 年耻辱的最低点。

但是,当我们追溯过去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 1500—1800 年代,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

1453 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宗教、政治和商业中心从此与欧洲文明的其余部分隔离。欧洲东部与中部在后来的 200

多年中一直在这种威胁之下。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现代早期欧洲文明最低落的时期。欧洲的强盛只是过去的一个回忆,而它后来的崛起还未现端倪。相应的,1453年的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辉煌成就。无论是从国家的疆域、人口、农业、商业、财富、智慧、科技、军事,还是从烹饪、学术、文学及艺术等方面来衡量,明朝都毋庸置疑地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步向衰落,但是这种衰落直到1800年才真正显示出来)。

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平靖了欧亚大陆两端,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丝绸之路往来贸易,但直到1500年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交流。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远洋航海的能力,并在1405—1433年展现了这种强大的力量。巨大的中国舰队穿越了整个印度洋,最远到达了阿拉伯半岛南部、东非以及莫桑比克(参见图1)。然而,当这些航海结束后,中国在文化、政治和财富方面的优越性以及担心外来势力对国家整体构成的威胁,使得中国逐渐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1498年,当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乘船绕过南非在印度登陆时,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人已在那个世纪早期航行到这一带。

明朝是由一些才智超群的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他们构建起的一系列政治体制至清朝虽有所改动,但基本制度实际上延续了500多年。明朝根基稳固,其政治安定和社会

繁荣延续了两个世纪,即延续到了17世纪。由于政府注重维护农田水利、兴修运河,并保证社仓充盈,明朝的农业得以保持繁荣。从东南亚进口的新稻种和从美洲经菲律宾引进的新作物(玉米、花生以及马铃薯)增加了食物的供给,其结果使中国拥有了更多更健康的人口。虽然,从事商业历来为儒家的道德观所贬斥,但明朝的商业十分繁荣。中国对外输出丝、茶和瓷器——为世界所艳羡——其结果是大量产于墨西哥和秘鲁矿山中的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铜,它们逐渐取代了纸币,成为通货。在17世纪早期,以白银作为通货的中国吸纳了南美银矿的一半产量。

1500年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3500年来历史发展的产物,因为在这3500年间,中国文化在东亚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基本上都建筑在中国的文字、帝国体系和儒家思想基础上,一方面强调有等级的宗族、政治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强调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原则挑选政府官员。

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相对疏离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或者称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人把自己国家看作是世界中心,并因此命名为“中国”,而把世界其他国家唤作“外国”。中国的皇帝——被称作“天子”——被认为是以天的权威与意志来实行统治。根据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人类应该按宇宙的

等级秩序来复制自己的社会秩序。中国的皇帝就好比北极星。如同其他星辰围绕北极星一样,其他人也应遵循等级秩序以皇帝为中心实现自我组织。中国把中国以外的世界也看作这一高度理想体系的延伸,以一种等级式和非平等的态度看待其他国家。

对中国来说,外部世界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一些“汉化”地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中国且广泛地吸收了中国文化。主要是朝鲜、越南、琉球岛,有时也包括日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亚洲的内陆地区,那里的人,在人种和文化上都不是中国人。“汉化”地区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边疆相接,而亚洲内陆却邻接中国的北部和西部。第三部分是由“外夷”构成的外部地区,它包括东南亚、南亚和欧洲。

中国人在传统上将所有异己国家视为低一等的,并期望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国的附属国。中国皇帝被认为是由于他超人的品质而得以统治天下,他的恩威不仅施与国人,外人也能分沾其润。为了接受皇帝的恩惠,这些“化外之邦”会跋山涉水来到帝国朝廷接受文化熏濡。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异邦不断派遣使臣携带贡品来到中国。当然,这些贡品标志着他们处于中国的藩属地位。作为回报,他们也接受了作为家长身份的皇帝的善意馈赠。这种回赠的数量有时在事前已有协商,以达到消弭外藩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朝廷在召见这些使臣时还附带

有三拜九磕的礼仪要求。通常情况下,这些使臣及商人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追溯整个中国历史,那些外交活动的实际情况并非总能符合上述理念,但是,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却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

中国中心主义观念随着中国实力的起伏而变迁着。公元220年汉朝衰落,到公元618年另一个伟大王朝——唐朝兴盛,期间的4个世纪,中国四分五裂,很难形成中国中心主义观念。这段时间内,中国和南亚以及内陆保持着实质性的接触,深受其文化的影响。佛教就于当时进入中国,且融入了中国文化。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国际化的时代之一,佛教的影响也达到了鼎盛。不仅印度、波斯和拜占庭通过丝绸之路穿过中亚内陆与中国进行交流,来自红海地区的无数阿拉伯商人也在中国的南方港口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唐朝与日本也有着广泛的交流。我们从唐三彩所刻画的各色种族就可见唐朝中外文化交流之一斑。

如果以疆土经略来衡量,清朝(1644—1911年)可称为中国最成功的朝代,这些其疆域经略在1800年前已全部完成。然而,清帝国并不符合中国中心主义——汉文化同化“蛮夷”——的模式。满族从东北进入中原并征服了中原,清王朝的统治成功归功于他们开创的多元混合的帝国。与人们先前的认识相反,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并不是汉族士大夫主导着清政府,而是那些满族统治者利用汉族

的官僚机制来实现满族精英对中华帝国的统治。

虽然早在明朝,商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海外贸易,但这种行为实际上为政府所不容。在整个 14 世纪,一系列的贸易限制政策相继出台。例如,在 1394 年,普通中国人被禁止使用外国香料及其他外国货。对外贸易被严格限定于和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几个国家。到了 16 世纪,由于对外贸易的压力增大而政府对走私的打击成效甚微,国家最后不得不在 1567 年部分解除了外贸禁令。政府试图通过发布许可证的方式控制对外贸易,那些没有许可证的商人一旦冒险进行海外贸易,将有可能遭到严厉的制裁,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儒家思想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认为商人重利轻义。自古以来,商人总被排在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然而,经商可以致富的现实使众人不顾儒家观念的歧视融入到商人的行列中。很多担任官职的士大夫对违反外贸禁令的种种行为,也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明朝末期,针对沿海及外洋贸易的禁令苛刻严厉,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实际上与海盗无异。首批定居台湾的来自内陆的人就是由一伙海盗和走私货物的商人组成的。1620—1660 年间世界贸易体系的严重萧条阻断了美洲白银向中国的流入,加重了明朝晚期的通货膨胀。由于明朝后期几位帝王缺乏作为统治者的才能,使他们无力应付上述问题,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崩溃。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迅速推翻了明朝。这种情况为中国满族